

第一章 危机与图存

●炮口下的震撼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这是乾隆帝心情舒畅的一个年头。首先,他派福康安把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人追赶到加德满都的南山,其次,这年是他 83 岁寿辰,在位也已逾半个世纪,特别是乾隆帝听说英帝国也要派马嘎尔尼使团踏着万里汹涌的波涛而来,为他祝寿。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又一个化外之邦将沐浴在中华帝国的恩泽之中。这是何等威风!

在东北热河的行宫里,乾隆皇帝仔细读完了东印度公司转来的英王祝寿信函,信中对乾隆皇帝的吹捧以及对大清王朝的羡慕使得皇上龙颜大悦,遂下旨福建、浙江、山东等地方督抚委派要员,迅速护送马嘎尔尼一行进京祝寿。

但在直隶总督官邸,长芦盐政徵瑞告诉马嘎尔

尼等人，在大厅顶端的角落里供奉我们大清皇上的圣旨，见圣旨如见御驾亲临，必须上前行礼。

马嘎尔尼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奇怪的礼节，尤其是让他对着黑暗中的一把椅子行礼，更让他感到别扭。但碍于礼节，这位颇有涵养的英国绅士还是向那把莫名其妙的椅子鞠了一躬。

到达北京后，微瑞告诉他，见中国皇帝必须跪拜磕头。马嘎尔尼的涵养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对他来说是非常特殊的要求，他断然拒绝了微瑞的要求，只愿意在见乾隆皇帝时像见英王一样，行单腿下跪礼。

英使竟然拒绝行跪拜磕头之礼，在好大喜功的乾隆看来，这就意味着英国拒绝以属国自居，这不能不引起乾隆皇帝的反感。这种反感使英国人提出的通商、割让广东省城附近一处小地方供英人居住、在北京派驻常任使节等 7 项要求自然也遭到了拒绝。乾隆皇帝在复文中对英方要求割让一处小地方以供居住的不情之请严正声明：“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土森然。即岛屿沙洲亦画界分疆，各有所属。……此事尤不便准行。”

乾隆帝在斩钉截铁地驳斥英国的侵略论调时，也将对外开放的要求拒之门外。这一错误的决策，与时代的潮流格格不入。18 世纪中叶以来，当欧亚大陆的西部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东部的大清帝国还沉浸在“康乾盛世”的自我欣赏与

陶醉中。从 18 世纪向 19 世纪的跨越,成为东方与西方的分水岭,乾隆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中国在未来 50 年的停滞,酿成中国在即将到来的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被动挨打的悲剧。

马嘎尔尼回去了,带着失败后的惆怅和失落于乾隆五十九年八月(1794 年 9 月)回到了朴茨茅斯港,结束了两年之久的中国之行。但一贯推行“扩张政策”的英国人并未因此而放弃他们对中国的侵略。时隔 45 年,道光十九年四至五月(1839 年 6 月)中国人在虎门海滩上演出了一幕销毁鸦片的壮举。狂热的英国资产阶级以此为借口,要求英国政府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补偿和“雪耻”。在他们的煽动下,英国资产阶级议会通过了对华战争的提案,组织东方远征军张牙舞爪地向中国扑来。

在两年多的战争中,虽然其间不乏中国官兵的英勇抵抗,也有杨芳的收集妇女溺器以破英人的邪教法术的丑陋之举,但命运似乎早已就作好了安排。中国官兵的英勇只能表现为一种悲怆。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五(1842 年 8 月 10 日),英国的 80 余艘军舰逼近南京江面,扬言要炮轰南京,千年的古都有毁于一旦的可能。此时的道光皇帝从犹豫动摇中变得坚决起来,那就是坚决地投降。其间的苦楚和辛酸恐怕只有道光皇帝本人才能深深地体会到。这位从 6 岁开始就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的皇

帝，满脑子装的是天朝上国、惟我独尊的观念，特别是在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他曾得到他祖、父两辈的夸奖，他从心眼里瞧不起那些泛舟东来的西方人，而现在要向他瞧不起的英国人投降，那该是怎样的感受。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而宣告结束。

战争是结束了，但留给人们的思考却远没有结束。为什么“天朝上国”的大清王朝败给了蕞尔小邦的英国？是武器的陈旧还是社会的落后？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感受最深的要算那批曾经在战争中与英国人打过交道而又善于思考和总结的官员们，他人是很难能有与他们一样的感受同的。林则徐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在战争以前，这位封疆大吏也曾相信过夷人的腿是僵直而不能弯曲的，也相信过只要我朝的茶叶和大黄不出口就足以制服夷人，而战争使他对“泰西”的朦胧感变得清晰起来，他深深地反思着中国人为什么就那么的不经打？深深的反思使他痛苦而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弱点：“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若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转展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列戎行之人，而皆觐面接仗，似此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

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应该说,林则徐对于这个问题的反思还是停留在热兵器和冷兵器的层面上,但就他的思考所得,这仗确实是无法打了,中国是落后了,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天朝上国的光环再也不能保证我们能傲视群雄了。

而以魏源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在英国炮火的震撼下也在积极思考,他们所思考的是怎样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怎样才能摆脱我为鱼肉的局面?

这位出生于小官僚家庭的小少爷,极为聪明,熟读四书五经,受过传统的教育,13岁参加科举考试时就曾以‘腹内写乾坤’来对主考官‘杯中有太极’的上联而备受人们的称赞,虽然他也热望能在仕途上搏得一官半职,但鸦片战争的血的教训使他更为民族的前途而担忧。他深深地感受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弱肉强食是一条铁定的规律,要想摆脱我为鱼肉的局面只有‘师夷长技以制夷’;‘善师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四夷制之’。为此,他提出了一整套兵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的方案,魏源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还主张在中国设立兵工厂和造船厂,聘请西洋技师,学习西方制造新式武器,后来,他又从仿造外国军舰到主张自造商船,从仿造新式枪炮到主张自造民用机器,并要求允许私人设立厂局,制造轮船、器械等自行出售。他本人的思想是在不断深化的,尤其他那

“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的议论启迪了后人的思考。虽然魏源的认识没有后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资产阶级是“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那么的精当，但他对如何应付资产阶级侵略挑战的认识却不能不说慧眼独具。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鼓辘之声也业已绝耳,但惊魂甫定的大清王朝怎么也没想到他们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轻易接受那一条款“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却给他们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英国人首先在道光二十五年(1854年)以利益“一体均沾”为由,向大清王朝提出了修改《中英南京条约》的要求,未能引起咸丰皇帝的注意和重视,最终引发了双方的武装冲突——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是英法侵略者又一次发动的以手枪对准脑袋的野蛮方式,旨在逼迫清政府进一步承认其侵略特权的战争。

战争开始后,清军屡战屡败,溃不成军,使以咸丰皇帝为首的清王朝丧失了战斗下去的决心,咸丰皇帝把朝廷大权委诸狂妄自负的肃顺等人。咸丰十

年六月(1860年7月),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大沽口外的炮声再次震撼了大清王朝,咸丰皇帝身处危局。他不顾群臣的劝阻,于咸丰十年八月初八(1860年9月22日),在肃顺、载垣、端华等亲信王公大臣的扈跽下,从北京匆忙逃往热河避难。咸丰皇帝出逃时尚希望风平浪静、国泰民安之后,他再回金銮殿做他的太平皇帝。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回北京之时,却是躺在灵柩里,在这批怂恿他出逃的亲信王公大臣的陪伴下,以其 31 岁的盛年早早地做了东陵的一员。

在咸丰‘北狩’热河的时候,奕訢授命于危难之际,这实际上是咸丰皇帝企图借英法之刀来杀人。奕訢自己也明知这是个吃力而不讨好的苦差使,但凭着忠于朝廷的责任心和希望能够东山再起,奕訢使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咸丰五年八月(1855年9月)前,奕訢曾经一度是清廷中权倾朝野之人,由于奕訢的生母、咸丰皇帝的养母康慈皇贵太妃在弥留之际,误触了咸丰皇帝与奕訢兄弟俩在早年争立皇储的痛疮。当年,道光皇帝在立皇储的问题上曾经一度举棋不定,从感情和才华上讲,他更愿意立六子奕訢为皇储,但奕訢年轻气盛,锋芒太露。从宗法和祖训上讲,他又得立四子奕訢为皇储,因为奕訢是当时活着的诸子中最长者,他为皇储是天经地义的,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也似乎规定了奕訢为皇储。另一方面,清廷

的祖训是法天敬祖，勤政爱民，虽然奕訢的才华不如奕訢，也不能创新，但却能守成，特别是经过奕訢的一番德性仁孝的“表演”之后，道光皇帝终于下定决心由奕訢继位。早年难堪的往事一经康慈皇贵太妃提起，咸丰皇帝于咸丰五年八月（1855年9月）发布上谕，罢斥了奕訢的所有职务。一日之间，旦夕祸福，奕訢饱尝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赋闲了5年的奕訢终于在咸丰十年（1860年）得到了重新崛起的机会，在北京城内与英法联军周旋，于咸丰十年九月（10月）在内务府大堂与英法联军签订了《北京条约》，完成了咸丰皇帝交给的议和任务，结束了3年的战争，挽救了清王朝的危急局面。同时，他也为自己在咸丰皇帝那里争得了一席之地，一扫前5年的晦气，为他日后掌权奠定了基础。

这位从3岁开始就进上书房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的公子哥，凭着一手好骑射和好武功以及道光皇帝个人对他的宠爱，早就养成了那骄傲自大的个性。

但是，忍辱负重的谈判以及英法联军的大炮教育了他，奕訢对敌强我弱的时局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思想发生了痛苦的转变。这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的一整套新的外交内政思想在悄悄完善。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他向咸丰皇帝上了《统筹全局折》，对时局作了深刻的分析，主张对外

“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关于当前的战略;“臣等就会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咸丰皇帝对奕訢的奏折甚为重视,这并不是出于兄弟手足之情,而由于奕訢分析得细致有理,特别是奕訢认为发捻当为心腹之患,必须彻底“医治”,而外夷只是要求通商割地而已,他们没有覆灭清廷之意,对清廷来说充其量是肘腋之患,两害相权取其轻,当务之急是剿发捻。咸丰皇帝把奏折交热河行宫的王公大臣们速议,他们一致认为奏中所言均为实情,可照原议办理,并由咸丰皇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奕訢、桂良、文祥管理,开始了晚清的洋务运动。

●反叛时的焦虑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声着实使大清王朝心有余悸了多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割地赔款条款使得大清王朝的体面一损再损,道光皇帝的最后几年就是在这种内心充满了羞愧和焦虑中度过的。道光三十年一月二十六日(1850年3月9日),心力憔悴

的道光皇帝终于撒手人寰而西去。

咸丰皇帝虽然可以不费太大的心机便从他的父亲手中潇洒地取得皇位，但他却不能潇洒地当好大清王朝这个家，因为从他的祖父至曾祖父时代便开始积蓄着的社会积弊，终于在他登基不到一年的时候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尽管在此以前，以龚自珍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们已经意识到“山中之民必将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龚自珍甚至把此时的清王朝比作是黄昏之落日，其批判之声亦振聋发聩，使人耳目一新。但批判的武器毕竟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要喊醒仍在封建旧屋里这批早已沉沉睡去的人们，打破他们歌舞升平的美梦，只有利用武器的批判。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 年 1 月 11 日），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领袖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南国点燃了战火，吹响了推翻大清王朝的号角。

说实在的，咸丰皇帝起初并未把这批“长毛”的反叛当作一回事，在他看来，这只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走投无路的一群毛贼们所玩弄的要挟朝廷的把戏，但当朝廷几次派兵弹压均告失败，咸丰皇帝这才感到自己当初的想法是那样的好笑和幼稚。接着，太平天国在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从南国直捣金陵，饮马长江。这迫使咸丰皇帝召集群臣商讨国策，命令各省兴办团练以镇压起义。虽然在以后的两年时间

里，清廷肃清了太平军的北伐军和增派的援军，初步解除了太平军对京都的威胁，但定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政权，却始终是大清王朝的咸丰皇帝食不香，寝不宁的一块心病。

太平天国起义无疑是给被外国侵略者业已弄得焦头烂额的清王朝雪上加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王朝也可以说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但这批“毛贼”绝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们怀着一腔热血，抱着“上为上天报瞋天之恨，下为百姓解下首之苦”的宗旨，拿起长矛、大刀揭竿而起。一路高奏凯歌，于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攻占金陵，改称天京，定都在此。

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批土得不能再土的农民、手工业者、烧炭工人、挑夫等等，居然比他们的对手能更快地接受新式的洋枪洋炮等热兵器，这种接受固然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所使然，但其背后却反映着心态和观念的变化。太平天国最早使用洋枪洋炮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定都之后；据吴健彰禀称，查获宁波钓船一只，内有夷人三名，洋剑一把，洋枪六千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药一罐，并在夷人身上搜出夷书一封，上有真命太平天国等字样，当即拆阅，查系英吉利奸商勒纳吐致镇江逆酋罗大纲一书，又附带上海逆首刘丽川逆书一件。讯据船户王阿莫等称：系夷人雇装兵器至镇江卖给贼匪者。”这段话

清楚无误地告诉我们，太平天国在咸丰三年（1853年）已积极购进洋枪洋炮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太平天国的其他各军也纷纷通过种种渠道获得洋枪洋炮，包括购买和在战争中缴获。正因为如此，日后关于太平天国使用洋枪洋炮不绝于书的记载。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藩攻陷安福县时“夺获洋枪炮藤牌四百余件”咸丰九年（1859年），曾国藩说太平右军主将韦志俊向湘军投降时所带“洋枪甚多”；同年胡林翼奏称太平军杨辅清攻池州城“施放洋枪子落如雨”；咸丰十年（1860年）后，李秀成经营江浙时洋枪洋炮就更多了，李鸿章说李秀成部“洋枪最多”。当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解救天京之围时“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曾国荃曾不无惭愧地说道：“贼之火器精利于我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打垒内，洋枪队多至两万杆。”

在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那儿，购买和使用先进的洋枪洋炮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打击自己的对手——大清王朝及其统领的清军，以便自己早日推翻这一政权，建立起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购买和使用洋枪洋炮的意义远不在于此，其真正的意义直到他们寿终正寝或慷慨赴义时也无法理解。

太平天国购买和使用洋枪洋炮使得部队的战斗

力大大地加强了，这迫使清朝统治者去思考应付的对策。以牙还牙，针锋相对是中国人传统的应付外来挑战的积极方法。

在清军中最早开始购买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的是曾国藩的湘军。早在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家乡办团练时就曾经派员赴广州购买洋式先进武器，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水师已经储备有夷炮600余尊。湘潭和岳州战役的胜利，“实赖洋炮之力”。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在20岁以前能一直跟着他那教督诸子甚严的父亲学习。28岁高中进士，长期在京师为官，可谓仕途得意。之后，他与倭仁等以理学相标榜。

曾国藩虽然长期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但他属于经世学派，他强调，人要重视实践。正是由于这一思想的指导，虽然曾国藩意识到过多的使用洋式武器的后果将是‘用夷变夏’的开始，但鸦片战争中，外国利炮的威力又促使他从内心深处感到非引进和购买洋枪洋炮不可。

湘军之后，迅速而全面使用洋式武器的当是李鸿章的淮军。

曾为曾国藩撰写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千里，内安外攘，旷世

难逢天下才”，并以门生长自居的李鸿章，比他的老师要开明得多，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受辱”，以学习西人“秘法”。其目的是对内可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对外可以抵御外来入侵。淮军有了这样一位比较开明的领导，当同治元年（1862 年）来到上海后，利用上海这远东新兴商埠得天独厚的优势，大肆购买洋枪洋炮，使淮军成为 19 世纪 60 年代装备最精良的中国军队，其洋枪洋炮的使用率在 80% 以上。

洋枪洋炮对于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作用，大概很少有人能有湘淮军的将领们那么深的感受。

太平天国购买洋枪洋炮给清廷居庙堂之高者造成的另一个压力，就是迫使这批庙堂中人同意“借师助剿”。

在咸丰皇帝时代，他是不愿意‘借师助剿’的，夷人的无事生非和借故滋事使咸丰皇帝一直心有余悸。请鬼容易送鬼难，所以他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861 年 1 月 24 日）的谕旨中说：“借夷剿贼，流弊滋多，自不可贪目前之利，而贻无穷之患。……夷性贪婪，一经允许借兵剿贼，必至索请多端，经费任其开销，地方被其蹂躏。”

然而，七月十七日（8 月 22 日），咸丰皇帝客死热河，九月三十日（11 月 2 日），那拉氏在北京发动政变，她和奕訢勾结掌握了清廷的大权。奕訢那两

害相权取其轻”的大政方针终于有了实施的机会，于是他们立即向外国侵略者表示了“友好”的态度，准备“借师助剿”。十一月初八(12月9日)，太平军一举攻克宁波，使中外势力深深地感到如不及早地剿灭太平军必定会留下无穷之患。于是乎中外势力一拍即合；“借师助剿”也终于成为清廷的国策，太平天国在他们的镇压下失败了。

无论是清军的购买洋枪洋炮还是“借师助剿”，从本质上说，都是清朝政府准备向外学习的开始，是清廷举办洋务的前奏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兴起。

第二章 鄙视与时尚

●无奈中的挪步

“夷”字出现于中国古书中已经无法确切地用年代来明示,但是北狄、南蛮、西戎、东夷的说法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特别是身居中原的人们。在这儿,夷和狄、蛮、戎一样,不是一个令被称呼者所自豪的桂冠,它是居住中原的人对居住在其以东的人的一种贱称。

明清之际,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浪潮迭起,欧洲人开始在“东方遍地是黄金”的引诱下泛舟东来,也许他们都是从我们祖国东方的海上而来,于是乎“夷”也被用于对他们的称呼,后逐渐泛指居住在华夏之外的异族。根据他们不同的肤色、发色,有称之为‘白夷’,亦有称之为‘红毛夷’者。自然,对异族称‘夷’所反映的中国人的心态和居住中原的人称呼居住周边

1832

1840